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少年哲学向导丛书

跨世纪的遐想

—邓小平哲学思想概要



序

《少年哲学向导》是我们赠送给少年朋友们的一束智慧之花。

哲学是开在人类智慧之树上的最高花朵。它的许多道理都是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才提出来的。它的道理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道理要抽象得多，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因此，许多人觉得它高深莫测，甚至感到神秘，认为少年朋友根本学不了哲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确实是深奥的，但决不是高深莫测的，更不是神秘的。

哲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肩负的使命就是把人的思想从宗教神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它标志着希腊人已经开始抛弃宗教神话的思维方式，改换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考虑世界了。在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的产生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宗教描绘的虚无缥缈的天国，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它的内容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如实反映。现实世界中一切现象都有规律可循，根本就不存在神秘的东西，所以，在哲学中也不会有神秘莫测的内容。实际上，少年朋友在生活和学习中都会遇到需要进行哲学思考的现象。哲学不在天国，就在少年朋友身边。

我们已从学习对象方面回答了少年朋友能不能学哲学的问题。这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半。要使回答圆满，还必须回答问题的另一半，就是少年朋友有没有能力学哲学。现在我们想请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写了一本叫《哲学与童年》的书，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围城》作者钱锺书老先生把它推荐给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已经出版了中文版。这本书举了大量的例子证明幼童生来就有进行哲学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表现在幼童会提出许多带有哲理性的问题。马修斯把这些问题看成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份请帖。这种能力还表现在幼童也会做哲理性的评论。幼童能够做到的，对少年朋友来说，当然更是不在话下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少年朋友的生活阅历和科学知识不断丰富。当代的少年朋友更今非昔比，他们都持有进行哲学思考的“请帖”，会提出更多更富有哲理性的问题，随着他们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能力的增长，他们也会做出更多更好的哲理性的评论。所以，对少年朋友来说，不是有没有哲学思考能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去启迪它和发展它的问题。

对要不要启迪和发展少年朋友的哲学思考能力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对人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希望少年朋友中能够出现像马克思和毛泽东那样伟大的哲学家，但这不是我们帮助少年朋友发展哲学思考能力的主要目的，更不是唯一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少年朋友生活得更好，学习得更好，将来工作得更好。哲学可以陶冶少年朋友的情操，使他们成为精神世界丰富和高尚的人。它可以帮助少年朋友把握好人生航船的舵轮，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都能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少年朋友掌握了哲学的思考方法，会如虎添翼，在学习、生活和将来的工作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人类做出突出的贡献。

可惜，我们家长、老师，甚至整个社会在对少年朋友的教育中，只注重灌输知识，忽视去启迪和发展他们的哲学思考能力，使许多少年朋友成为记忆的机器，而不是生动活泼的创造者。毫无疑问，少年时期应该多学些知识，

但是不应当把它们变成死的东西塞进少年朋友的头脑，而应当使它们成为活的东西，让少年朋友启动自己的头脑去主动地掌握它们。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当传授思想方法。我们既要使少年朋友知识化，也要使少年朋友智慧化。学习哲学是锻炼思维、启迪智慧的最可靠的途径。

哲学是个大世界。在这里，既有自然规律的探寻、社会之谜的寻觅，也有思想面纱的撩拨；既有真的揭示、善的启迪，也有美的追求；既放射着西方哲学大师的理性之光，也迸发着中国哲人的智慧火花……这个大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不能一一展示。我们力求把其中的精华奉献给大家。

智慧对人来说是最宝贵的东西。愿少年朋友都成为爱智慧和拥有智慧的人。

内容提要

伟人自有伟人的哲学思想。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20 世纪的世界风云人物，也有自己特色独具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处处透射出实践的智慧，是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指南。

本书概略考察了邓小平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观条件、主要特点及发展历程和伟大意义；着力阐扬了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派”、“尊重实践”、“照辩证法办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群众路线”和“立足于独立自主”等等思想精华。

该书语言通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是少年朋友步入邓小平哲学思想殿堂的入门向导。

跨世纪的遐想 邓小平哲学思想概要

一、伟大的时代，难得的人才，独特的哲学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特点及其他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曾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在另外的场合，毛泽东还说过，邓小平人才难得。毛泽东慧眼识英雄，历史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毛泽东为什么对邓小平作这样高度的评价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恐怕不能忽视，这就是邓小平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位真正的理论家。

对于什么是理论家，毛泽东有其独到的看法。1942年2月，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4页）

邓小平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或哲学家。他真正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

作为真正的理论家、哲学家，邓小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创立，既离不开时代特点、社会实践等客观条件，也是他独具的主体条件（如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良好的精神品格等等）所使然。像任何事物都有过程一样，邓小平哲学思想也有自己发展的历程；像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样，邓小平哲学思想也有自己的特点，是别具一格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指引人们在实践中走向胜利的旗帜。

1. 时代的呼唤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它告诉人们，真正的哲学都是受时代制约的，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哲学离不开时代的需要，邓小平哲学思想自然也是时代呼唤出来的。

应当指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时代基础，与毛泽东哲学思想赖以产生的时代基础，自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就是说，它也离不开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离不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

但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许多方面，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而且，邓小平是在毛泽东谢世之后才更加充分地展示其哲学才华的，因此，邓小平哲学思想又与新的时代内容和特点联系在一起。考察这个问题，应当从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时说起。

我们国家在1956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从那时起，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经历了22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但是这22年，我们所走过的

道路是曲折的、伴有痛苦的。虽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在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同旧中国相比，有了天壤之别，但由于长时期的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经济上执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力发展速度是缓慢的，有时是停滞甚至倒退的，人民生活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政治运动不断，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安宁的状态。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就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和发展前途的本质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正确的回答和解决，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要么是跳不出原有的框框，回到“左”倾的老路上去；要么迷失根本政治方向，滑向其他的错误道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正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这一课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从国际上看，时代也具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一是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继续朝着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各国建设的方向发展。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使我们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二是高科技迅速发展。从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场以高科技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它把整个世界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科技时代。这次技术革命，是继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以“机械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它以信息化为特征，在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宇航技术、超导材料等技术领域都有迅猛的发展。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整个世界。这对我们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良好的机遇。我们如不急起直追，就有可能被更远地抛在后面；相反地，如果我们能及时引进和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就会加快建设的步伐，更好地发展自己。三是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趋势。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无论是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北方的发达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同，改革的理论、原因、目的、内容及具体做法都有根本区别，但改革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都抗拒不了的，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使社会经济朝着对内更加自由、对外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与此相联系，各个国家都意识到，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高度社会化、商品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不可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在自然资源、科学技术、资金和商品、劳务市场等方面，各国都是相互依赖的。于是，都注重对外开放，广泛建立外交关系。对外开放也成为世界性潮流。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必然波及到中国，向中国人民提出如何顺应世界潮流，搞好本国的改革开放的问题。

邓小平哲学思想正是在既总结国内建设经验又研究世界形势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2. 站在巨人的肩上

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谈到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这里，牛顿以形象的比喻和切身的体会道出一个真理：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继承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科学的发展是这样，哲学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也是以以往的哲学为基

基础，立于哲学巨人肩上的。具体地说，它是奠定于马列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基础之上，并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直接理论来源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科学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批判地采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抛弃了它的形而上学和有关宗教、伦理等学说的唯心主义杂质，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创造了和过去的一切哲学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哲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和国内外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坚持、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写下了许多哲学著作，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创造性的发展。列宁的所有著作都科学地运用和精辟地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首先是在他接触和接受马列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接触、学习、研究和把握，是在1920年至1927年（16岁至23岁）留法、留苏期间进行的。1920年9月到10月间，邓小平乘着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航程三万余里，踏上了法兰西土地。在这里，他一住5年多，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接受并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搞的共产主义宣传，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1926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坐上北去的列车，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就学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即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专为苏联东部民族和东方国家培训革命干部。中山大学，即中山劳动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可以说，这两所大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课堂。中山大学的必修课程就包括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著作等。这就为邓小平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说，邓小平在法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把握是零碎的、粗浅的，那么，在苏联的学习，则是较为全面、系统和精深的，打下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包括马列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了。

邓小平读马列的书，读得很精，他能通过实践来把握其精神实质。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谈话中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并不在于也决不在于大本子多，而是因为它经得起实践的反复检验。所以，“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同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能搞本本主义、形式主义，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把握精神实质并能在实践中正确运用和发展。

尽管邓小平读马列的入门书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但并非就停留在此。他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关键时刻，都要读一些马列的书。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中记述了邓小平在江西的3年又

4 个月的生活。在那一段时间里，邓小平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这为他尔后的思想包括其哲学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马列主义哲学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般性理论基础，那么，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殊性理论基础。没有马列主义哲学，固然没有邓小平的哲学，但是，仅有马列主义哲学，并非必然会有邓小平的哲学，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式的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深深植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之中。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哲学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产生及其发展过程中，教育了几代人。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代人的代表。

1978 年 12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自己曾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38—139 页〕确实，毛泽东哲学思想培育了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特殊的偏爱，特别重视对毛泽东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陈云曾根据自己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受益很大的切身体会，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提到、肯定了陈云的建议，并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同上，第 267—268 页）为了学好毛泽东哲学思想，他要求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选编一下。他还要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邓小平不仅深刻领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事求是、实践观点、矛盾观点和群众路线等等，而且从毛泽东身上直接学会了运用这些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那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更是深深地影响了邓小平。打开 3 卷《邓小平文选》，邓小平直接或间接地引用毛泽东哲学观点的地方随处可见。

需要特别地指出，正如邓小平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一样，他更注意抓住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他特别反对的是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可以说，邓小平在深刻领悟、准确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非常人能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真正地坚持、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假如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没有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是站在历史巨人毛泽东肩上的新时代的巨人。

3 . 思想认识上的大飞跃

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人，往往有不同的思想和行为。邓小平能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与他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完成思想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邓小平的生涯中，对其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他思想认识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飞跃。

第一次飞跃，从 1920 年至 1926 年，从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主义上升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次飞跃，是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个国际大环境中实现的。

1919 年，年仅 15 岁的邓小平考入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 年，他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来到法国的马赛勤工俭学，但他的理想很快就被法国当时的现实打得粉碎。由于经费紧张，生活拮据，5 个月过后，邓小平便结束了学习生涯。“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的道路。邓小平后来曾回忆道：“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我的父亲邓小平》第 82 页）

1921 年 4 月 2 日，邓小平经人介绍来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做工。从此，他便开始了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外籍工人的长达二三年的“勤工”生活。在施奈德工厂的勤工实践，使邓小平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困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灵，受到不小的震撼。但是，那时的他毕竟年轻，毕竟对人生充满着美好的追求，所以，正如他后来在莫斯科时所回忆的：“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同上，第 85 页）这时的邓小平，虽已在国内参加过“五四”运动，虽已饱受勤工俭学所遇到的磨难，但在思想认识上，还仅仅具有初步的觉悟和进步意识，还未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感召，还未跻身于自觉地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行列。

1921 年 4 月 23 日，邓小平离开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了巴黎。经过失工、就业又失业的磨难，他于次年 2 月，进入了位于巴黎以南的哈金森工厂，渡过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并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中的一次巨大的转折。因为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1923 年，他离开哈金森工厂，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如果说当 1922 年初邓小平进入哈金森工厂时，还仅仅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的话，那么，在 1923 年 3 月他离开哈金森工厂时，便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

1924 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初，又赴苏联就学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用整整一年时间学习和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在党组织的锤炼下，在共产主义大学堂从理论上的系统培养中，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具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可以说，到 1926 年底，即在邓小平奉命回国之际，也就是在他 23 岁的时候，邓小平成功地实现了思想认识

上的第一次飞跃——从“工业救国”的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第一次飞跃使邓小平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那么，第二次飞跃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把握。这次飞跃，是他从苏联回国之后，在与“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

1927年春，邓小平回到祖国。这时，正值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内开始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的时期。8月7日，邓小平在武汉列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批判，使他对右倾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初步认识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亲眼目睹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导致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丢失，亲身领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苦。这一切，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胜利，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行的，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从正面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

1943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88页〕因此，必须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同上，第89页）这表明，邓小平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深刻地领悟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自觉地把它作为党的事业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二次大的飞跃。

从此以后，邓小平始终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并把它作为自己一切行动和思考问题的座右铭。他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4. 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不仅有思想和理论上的基础，而且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不开，而他的经验又主要来源于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极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活动经验的领导者。他的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不多见的。1904年农历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5岁进私塾发蒙，6岁进协兴乡的初级小学读书。他11岁的时候，考入广安县的高小，14岁高小毕业，考入了广安县中学。16岁至23岁，他留法、留苏，开阔了视野，形成广阔的胸怀。1927年，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得以了解全党的大局；1929年，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又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1934年，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1942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945年6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7月，中共中央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1954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3年，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1976年4月，邓小平又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从此以后，邓小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使命。

从邓小平极其丰富的社会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实践活动涉及党、政、军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这种丰富的社会经历，为其哲学思想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邓小平是一位历经风浪的人。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在他的《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一书中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是的，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确经历过“三落三起”，这使他的社会经历带有某种传奇色彩。

第一次“落”，发生于1931年夏天。当时，红军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形势尖锐复杂。邓小平经中共中央批准，前往以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他到任后，迅速为前一时蒙受过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召开了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局面大为改观。1932年冬，他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就在这个时候，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抵制“左”倾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临时中央开展了一场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第一次“落”后，邓小平很快地就“起”了。1934年10月，他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第二次“落”，发生于1966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期间。这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邓小平就被戴上“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等帽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第二次被“打倒”。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1969年10月后，邓小平又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在那里渡过了3个艰难的春秋。林彪的反革命

政变阴谋失败后，邓小平得以第二次“起来”。1973年，他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是在1976年。邓小平在1973年再次走上新的领导岗位，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到了1975年，他们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邓小平力挽狂澜，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当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代理总理，取代了邓小平的位置。接着，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四五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全国上下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打倒”。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10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在一部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职务。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正如国外报刊所称，“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传奇式的经历，使他既经受了顺境的锻炼，又经受了逆境的考验。正是在这极其复杂曲折的社会运动中，磨炼了他的意志，提高了他的能力，培养了他的务实、求是、创新的精神和辩证的思维方式。这是形成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条件。

5. 别具一格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首先是一位政治家、革命家，而不是一个以哲学研究为职业的哲学家。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认邓小平具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哲学家。这里，必须破除对哲学概念的传统理解。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义的哲学：一种是以各种特定的范畴、规律、规则出现的逻辑化了的哲学，像康德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哲学，都是这样的哲学。这可以称为理论哲学或纯哲学。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理论哲学。另一种是深悟哲学的精神实质，精通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能将其内在的、艺术地渗透于实践运动中。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哲学，可以称为应用哲学或实践哲学。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无疑属于后者。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活生生的哲学，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的、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运动中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换句话说，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特别是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强烈的实践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

从邓小平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条全新的哲学思路，一种与实践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活生生的哲学，一种与民族精神的搏动融合在一起的希望之光。在

这里，如果谁试图按照纯理论哲学的研究方式，来寻找各种哲学术语、哲学理论体系，将是一种空想，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你深入到邓小平的实践活动中去，透视一下他的大量著作，便会发现许多带有丰富哲理的警句妙语，给你以无穷的智慧。

从理论上说，邓小平的哲学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没有像传统哲学体系那样，截然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四大块，而是带有综合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其核心是实事求是。围绕着实事求是，他着重强调了实践观点、辩证观点、生产力观点、群众观点和自主观点。如果说，实事求是贯穿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条红线，那么，这五大观点，就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五大理论支柱。只有抓住实事求是这个核心和五大观点并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地领略邓小平的哲学思想。

6. 发展的历程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伴随着他的实践活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又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我们要把握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既要着眼其特点，又要着眼其发展。

大体说来，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至1949年，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在历史舞台上，他主要是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面目出现。与此相适应，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以军事为基调的。在这期间，他曾与刘伯承一起率领一二九师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提出照辩证法办事，辩证地处理了“革命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这四种力量的关系，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群众组织、党的领导既统一起来，又注意抓住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中心，使它们在相互配合中协调发展，从而使根据地的工作蓬勃开展，成绩卓著。在解放战争中，他的军事战略家的才能又进一步展示出来。他与刘伯承一起指挥的刘邓大军，渡黄河，过长江，从中原一直挺进大西南，纵横几千里，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实现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

第二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包括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和“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这一时期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主流上说，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在历史舞台上，邓小平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家而出现的，与此相适应，他的哲学思想，也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基调。在这期间，他强调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并指出搞建设的指导思想，一是面对国家的现实，二是面对群众的需要。为了搞好经济建设，他开始从体制上思考问题。为了整顿由“大跃进”带来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现象，特别是为了解决工业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他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调整工业、整顿企业的具体意见。1975年，针对我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全面整顿的基本思想，就是大胆揭露矛盾，并通过适当形式的斗争解决矛盾。

第三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今，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是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与此相适应，他的哲学思想，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基调的。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最为辉煌的时期，也

就是说，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果。了解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最重要的就是把握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

如果作一点具体考察，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又可划分为如下几个小的阶段：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约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为第一小阶段。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历史使命是拨乱反正。他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深刻地论述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远意义，进而提出了与“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一切，对于打破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束缚，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

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召开，约3年零9个月的时间，为第二小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使命是反复阐明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他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重大意义，特别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他关于起草《决议》的9次谈话，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内容、灵魂和历史地位都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为党的十二大以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约5年的时间，为第三小阶段。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突出成就，一是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二是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三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一切，为中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

从1988年1月至今，为第四小阶段。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辉煌成果，集中体现于他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讲话中。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是在关键时期，由关键人物就一系列关键问题发表的一次关键性的讲话。他在谈话中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和“冒”的精神；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要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不要靠本本……这些精辟的论述，标志着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升华到一个新水平，为我们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现在，中国人民正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阔步前进。

7. 主要的贡献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虽然来源于马列主义哲学，特别是直接来源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决不是对马列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简单重复和机械照搬，而是有所创造地运用、丰富和发展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那么，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何在呢？

第一，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系统的概括和阐述，阐发了这一路线的丰富内容；揭示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论述了革命和建设都要靠实事求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进一步说明了实事求是革命和建设中的决定作用。

第二，提倡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他恢复了实践的权威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实践，强调真抓实干，反对只说不干，倡导务实精神。

第三，运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其中的矛盾学说。他重视事物的普遍联系，既注意事物的纵向联系，坚持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统一，强调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又注意事物的横向联系，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着眼于事物的特点和发展，用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把发展看作硬道理；科学运用矛盾学说，既坚持两点论，又强调重点，既看到矛盾普遍性，又注意矛盾特殊性，并把两点论与重点论、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了照辩证法办事。

第四，大力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进一步揭示了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分析了不同要素在生产力中的不同地位，特别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指出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阐明了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破除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僵化观念；特别突出的是，他反复申明生产力是判断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这一切，都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第五，坚持、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进一步阐述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强调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坚持科学决策的人民性，总是强调必须保证党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符合人民利益；坚持判断标准的人民性，总是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以及人民群众拥护与否作为判断政策得失成败和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坚持社会实践的人民性；总是在实践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善于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这一切，具体运用和发挥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

第六，运用和拓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他一贯主张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要求靠中国人自己办好中国的事情；自觉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光辉形象；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尊重其他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机统一起来，直接坚持和发挥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

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哲学的应用、使哲学走向生活、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认识工具的作用方面，

也有独到的贡献。

1957年初，毛泽东针对有些人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页）邓小平的贡献恰恰在于，他把“两回事”成功地变为“一回事”，即把哲学理论与具体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它内化于自己的思想中，又将其运用于具体实践特别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哲学的总结、概括功能和指导、预见作用。他把抽象的哲学理论和观点变为科学的方法论，使哲学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他的做“实事求是派”、“多做少说”、“让事实说话”、“照辩证法办事”、“发展是硬道理”、“走群众路线”等等说法，是他使哲学走向生活、贴近生活，从而正确而充分发挥哲学在实践中作用的生动体现。

总之，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他的哲学思想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8. 胜利的旗帜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的实践价值。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8—159页〕邓小平的理论（包括他的哲学思想），正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物。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能不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哲学理论；只有学习、研究和运用邓小平的理论，特别是他的哲学理论，才能更好地、真正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成果，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一面旗帜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十几年来，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都上升了一个大的高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今后，要将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要在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经受考验而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用邓小平的“特色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用“特色理论”武装我们呢？这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作出努力。但是，有一点是不应该忽视、不应该忘记的，就是要认真地学习、研究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因为，邓小平的“特色理论”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这就是他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最精

华的部分是内含于“特色理论”之中的；正是在这些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才使“特色理论”得以形成或创立。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离不开“特色理论”，那么，要真正用“特色理论”武装人们，则离不开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把握。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特色理论”；只有把握了“特色理论”，才能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经久不衰，从胜利走向胜利。

目前，我们正在走向世纪之交。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一个对于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关头。在这样的时刻和关头，风云变幻，问题丛生，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我们要不为曲折、挫折所惊退，不为重重迷雾所迷惑，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样，将是指引我们跨入新世纪、夺取新胜利的旗帜。

二、做实事求是派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是的,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抱有特殊的感情,是名副其实的实事求是派。他勇敢地冲破重重阻力,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概括了实事求是的丰富内涵,明确指明了实事求是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理论地位,充分阐扬了实事求是是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实践意义,尖锐批评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种种错误观点和做法,成功地把实事求是原则贯彻到各项实践中去。实事求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和精华所在,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全部思想中。

1. 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过,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这里,邓小平至少表明了三个意思:一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创立的;二是在一个时期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被抛弃了;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被重新确立。事实的确如此。

“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汉书》。东汉史学家班固为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古好学,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报之。”唐人颜师古将“实事求是”注为“务求真实,每求真是也”,指的是一种务实求真的学风。毛泽东撷取古之“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并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使其具有了全新的哲学内涵。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毛泽东不仅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哲学上的改造,而且把它倡导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取得成功的。

遗憾的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逐渐滋长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发生了脱离实际、违反国情的“左”倾错误,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严重破坏,以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而走出了历史的误区。而邓小平在这其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事实证明,邓小平是坚持、捍卫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光辉典范。

2.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当时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干部群众都热切地期待着党中央能拨乱反正，结束以往的混乱局面。但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

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提出后，立即受到邓小平的反对。他在几次重要讲话中，都对这个口号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明确指出它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

那么，这个口号错在哪里呢？归纳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如果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能纠正，我们党长期以来所犯的“左”倾错误也就只能继续下去。

第二，“两个凡是”割裂、歪曲、损害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说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指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它的科学体系。如果凡是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坚持，就会把毛泽东思想搞得支离破碎，不能根据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搞“两个凡是”，必然导致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毛泽东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讲的，而很多条件是变化的。比如现代化建设，有好多条件是毛泽东在世时没有的，有许多问题毛泽东也没有讲过，如果只是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许多问题如何解决？

总之，提出“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而在政治上则是为了阻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出来工作，阻止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巨大洪流，继续坚持以前的错误思想路线，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口号的尖锐批评，明确表明了他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坚定立场。

3.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不仅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本身作了系统概括的深刻阐明，而且精辟地论述了它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

为什么说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和精髓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

第一，实事求是整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精华。因为它体现着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的统一；体现着客观规律和自觉能动性的统一；体现着自由和

必然的统一。一句话，它既深刻地体现着彻底的唯物论，又深刻地体现着彻底的辩证法，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第二，实事求是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因为它体现了实践是认识基础的根本观点；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人类认识的基本过程；体现了真理产生和发展的根本规律。

第三，实事求是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因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所讲的实践，是社会实践，并且主要是指人民群众的实践；它所讲的理论和实践，除了自然科学理论和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以外，还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领域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因此，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一般原理，而且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

总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综合运用和集中体现。掌握了这一路线也就从根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所以说，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和精髓。

4.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在阐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理论上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实践意义。他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133页〕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只有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才能取得胜利。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所以遭到严重挫折，主要原因是由于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主义指导。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纠正党的错误，挽救了党和革命，使中国革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相继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胜利，根本原因也就在于他首先纠正了过去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反地，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原因也在于思想上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观主义地分析形势和看待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形势之所以能迅速好转和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也就在于首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一切失误和问题的出现，也都是由于在某些具体事情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路线。

为什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搞好革命与建设一切工作的关键呢？这是由于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经济路线、军事路线等各方面具体路线，以及一切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的思想基础。如果思想路线错了，其他各方面的具体路线以及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也都会发生错误。只有思想路线对头，才能正确地制定各方面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所以，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5.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突破性贡献，是主张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辩证的统一。

首先，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3页〕。解放思想之所以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归根到底是因为认识是由人去进行的，问题是由人去解决的。如果不解放思想，人就会成为“思想懒汉”，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这样下去，不仅实事求是办不到，而且，“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上，第133页）。这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是一个民族有无活力和能否发展的大事。所以，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1页〕

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必须打破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同上，第133页）思想僵化就是思想禁锢于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中，禁锢于旧的条条框框之中，一切从本本或上级指示出发，因循守旧，不敢思考，不敢创新的一种精神状态。思想僵化与解放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从两个方面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一是从习惯势力下解放出来，二是从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只有解放思想，打破思想僵化的主观精神状态，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其次，解放思想也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指针和方向，使解放了的思想为实事求是服务。解放思想若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个基础，思想便失去了自身蓬勃发展的营养，或者重新僵化，成为新的主观偏见的奴隶；或者全盘西化，看自己一无是处，看西方满盘皆好。

那么，解放思想如何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和方向呢？邓小平着重指出，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大局为前提，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总而言之，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要成功地走向未来，不实事求是是不行，不解放思想也不行，不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更不行。邓小平的这

一思想，为我们正确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明了方向。

6.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在实践中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把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那么，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呢？怎样把握和运用这一方法呢？

首先，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因为具体问题是具体条件构成的，具体分析具体问题也就是要分析具体条件。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问题时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6—277页〕所谓从“具体条件”出发，也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关系制宜”、“因对象制宜”。邓小平在谈到“因地制宜”时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同上，第276页）同样，“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同上，第114页）。这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精辟阐述。

其次，要把共性与个性、原则性与多样性统一起来把握。邓小平在同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指出：“你们是根据你们的条件来决定的，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条件来决定的。我们两国情况不一样，所以具体方法也不一样，但是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110页）这里所说的目标一致，是说有共性、有原则的统一性。条件不同，是说有个性，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把共性与个性、原则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

最后，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任何原则、方法都是从实际中来的，是对实际的内在规律性的总结。实际向前发展了，原则、方法也要改变。因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看到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坚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就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原则。反过来，不承认新的历史条件，否认新的历史条件，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说：“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6页〕因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讲新的历史条件”。

7.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防止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在反倾向斗争中，要坚持“两线作战”，既反右也反“左”，并且主要是防“左”。

据有人初步统计，最近10年来，邓小平在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同时，先后有44次谈到批评“左”、右两种倾向的问题。在这些谈话或论述中，他着重说明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根本上揭示了“左”、右两种倾向出现的客观必然性。他认为，搞改革、搞四化，不会一帆风顺。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必然会出现。

第二，从根本上揭示了“左”、右两种倾向共同的政治基础。他认为，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个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是否定改革开放，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两者各有特点，分属两个极端，然而却异曲同工，相互贯通，都歪曲和割裂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从根本上揭示了“左”、右两种倾向的共同本质。他认为，尽管“左”、右两种倾向一个声言坚持马克思主义，一个标榜发展马克思主义，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

第四，从根本上揭示了“左”右两种倾向共同的认识根源。他认为，无论是“左”的错误思潮，还是右的错误思潮，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第五，从根本上揭示了“左”、右两种倾向共同的危害作用。他认为，右的倾向，后果极其严重，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左”的倾向带来的损失同样巨大，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搞掉了。所以，只讲右的危害性，不讲“左”的危害性，或者只讲“左”的危害性，不讲右的危害性，都是片面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第六，明确强调必须进行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他认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反而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哪里有右倾，哪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往往是右倾的影子。只有坚持“两线作战”，才能正确地开展反倾向斗争。

第七，再三告诫人们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什么呢？他认为，因为“左”的东西在中国有着比右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是“左”的阶级基础，而中国长期是一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的国家；“左”的东西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中不仅没有彻底肃清，相反地得到不断地滋长、蔓延、巩固和强化，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左”的东西由于带有革命的色彩，因而更能迷惑人。

第八，阐明了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反倾向斗争，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地说，既反“左”，又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时注意防右。不能以右反“左”；反右时注意防“左”，不能以“左”反右。不管是反“左”，还是反右，都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而不是主观的臆造。

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思想，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个重要表现。

8 .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突出表现在他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上。

提到毛泽东，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从30年代起，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具有权威的领袖和导师。以他伟大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高举的旗帜。历史证明，他是一位为中国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立下丰功伟绩的世界巨人。遗憾的是，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在毛泽东逝世后，如何评价这位曾经有过极高威望、建树过巨大功绩而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领袖人物，是一个事关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和今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是一个在国际国内有很大影响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全国混乱、产生严重后果的问题。对此，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递交了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

1980年8月20日、22日，邓小平接受了专门采访世界领袖人物的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善于驾驭采访技巧的奥林埃娜·法拉奇，意味深长地问邓小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面对法拉奇含蓄的提问，邓小平十分轻松地告诉她，“要永远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第一，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要作客观的评价。他强调，要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形成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他批评了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另一种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能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意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分析党所犯错误的责任和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当然要承认个人责任，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第三，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决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混淆起来。两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第四，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不能感情用事。毛泽东犯错误有很多原因，有国际国内因素，也有认识的局限、经验的不足等问题。要重视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由于邓小平提出和坚持这些原则，使我们党能够在实事求是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错误过程中，不仅没有损害毛泽东的形象，而且由于把他从神变成人而进一步维护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

需要特别地指出，在中国，同毛泽东的关系，没有一个人比邓小平更富有传奇色彩、更具有复杂性。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有过三落三起的曲折，这三次起落，每次都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后两次，主要由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受的完全是诬妄之灾。但是，即使如此，他对毛泽东仍能作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评说。这种不计个人恩怨、勇于超越自我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充分表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大胸怀和高度的实事求是精神。

9. “一国两制”是在中国的实际

情况下提出来的

邓小平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们东南角上，游离着两块神秘的地域——香港和澳门。它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近一个世纪以来却悬挂着外国国旗。它们与祖国大陆近在咫尺，却由外国人统治管理。这两块地方的现状，说明我们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尚不完整。

金瓯不全，国人难安。人们在盼望统一，人们在寻求祖国统一的途径。“一国两制”——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构想，找到了一条实现祖国统一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略说法，“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8页）。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在于：

第一，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国家的权力，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性和中华民族统一性的体现，是“一国两制”存在的前提。

第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香港、澳门和台湾，设立中央人民政府统辖下的特别行政区。在这个特别行政区内，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实行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利。这是统一前提下的相对独立性和高度自治权的体现。

第三，中国的主体须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国两制”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一国两制”的构想。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范例。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国两制”的构想不是今天才形成的，在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8页）

那么，中国的实际是什么呢？

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处于分裂状态，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二，香港、澳门、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较发达，尤其是香港在国际金融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那里的人民已习惯于现有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他们希望在祖国统一的基础上保持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第三，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港、澳、台地区同大陆互相借鉴、补充、促进，共同为祖国的繁荣做贡献。

第四，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大陆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邓小平正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分析和尊重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1页）因此，“一国两制”的构想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范例。

三、尊重实践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观点。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拥护、坚持和倡导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并把它引入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列宁在同各种错误哲学派别作斗争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系统地论述了实践对于认识、理论的基础性的作用。邓小平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他恢复了实践的权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反对说空话、说大话和说假话；他勇于实践，敢于、敢闯、敢冒险。事实业已证明：邓小平是尊重实践的光辉典范，他的实践精神将永为世人所景仰。

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两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一件是拨乱反正，一件是改革开放。这两件大事都导源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由这场讨论而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而真理标准的讨论能够在全国开展起来，并取得很大的成功，是同邓小平的积极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分不开的。

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由一篇哲学文章引起的。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4月，《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时，看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章后，决定将这篇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修改，要求加强现实针对性，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阐述、批评。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正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时，便约请孙、胡两人共同研讨修改这篇文章，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近一个月的10余次修改，并经当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审阅定稿，刊登于5月10日出版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头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明确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得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赞扬和支持，同时，也遭到了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人的非难和反对。正当这场讨论受到巨大压力而处于困境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观点的错误，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同时，他批评道：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无疑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强有力的支持。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谈到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时，他说，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的问题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开展起来，并取得了胜利。这次讨论，打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强而有力的支持，是他尊重实践的光辉例证。

2.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这些话，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敢于实践的精神。

通常，人们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常规型的实践。这种实践是比较规范化的，它有一定的程式和历史的经验可以遵循，因而可以按一定的章法来办事，较为稳妥，少有危险。二是非常规型的实践。这种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或者是解决一个全新的问题或者是用

新的方式去处理老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便是典型的非常规型实践。对此，必须敢于闯，敢于试。

在邓小平看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首先要有敢试敢闯的主体精神，要有一股子气、劲，要有敢冒险的精神。世界上的事情是要由人去做的，人是一切行为的主体，主体精神状态上没有胆略，不敢闯，人云亦云，循规蹈矩，是办不成大事的。只有解决了头脑中“怕”的问题，才会有敢闯、敢试的精神，才能取得实践的成功。

邓小平还认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是去瞎想从而蛮干，而是要看得准。看得准与不准，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领导裁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试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仍是一个实践问题。通过实践，取得了经验，就可以走出新路子，发现好路子，从而干出新的事业来。如果错了，那就迅速改正过来。

不难看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包含试、闯的精神与试、闯的行为两个方面，只有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才是邓小平勇于实践精神的本来意义。

3. 让典型说话

让典型说话，也就是发挥典型的榜样作用，用事实来说明一切。邓小平在实践中十分注意让典型说话，这是他尊重实践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农村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坚持让典型说话。他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好多人在看。事实的确如此。全国第一个实行包干到户的是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978年12月该队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签订包干书，规定每户粮食除上交公粮外，产量全归自己。大包干使小岗穷队一年翻身。1979年粮食产量相当于1967年至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79年生产的油料，比合作化以来20多年的总和还要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第二年，凤阳县、肥西县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而在全国，安徽、四川两省首先行动起来，成为农村改革的先行省。当时，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性质，究竟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还是退回到“分田单干”？邓小平对这场争论及时给予指导。他在1980年5月31日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省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由于有了成功的典型，让典型说话，农村改革发展极快，家庭联产承包终于在全国范围全面铺开了。

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也运用了让典型说话的实践的方法。他不仅一切都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开，而且一直关心着那些影响全国的企业改革的典型。比如首钢，1981年实行企业改革试点，创立独具特色的首钢承包制，整个生产发生飞跃性变化。邓小平极为关心首钢这个改革的典型。1987年7月，在首钢改革遇到困难时，邓小平在首钢送来的紧急报告上批示：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了。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又专程视察首钢，

肯定首钢“方向对，路子好”。对首钢这样的企业改革典型的关心，就是邓小平让典型说话实践方法的具体运用。

邓小平认为，让典型说话，要允许看，不搞强制。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有些问题是“禁区”，人们对于类似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顾虑重重，步履维艰，这就要允许人们有一段弄通思想的时间；同时，尽管典型和榜样力量是重要的，但是各地的条件、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搞强制，也就失去了各地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搞一刀切，反而不利于实践的发展。因此，让典型说话，并不是要各地照典型的形式生搬硬套。邓小平指出，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让典型说话，只是用事实、用实践成果教育人，只是显示榜样的作用。这种作用必须允许别人看，允许别人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们在实践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中，邓小平主张真抓实干，不搞争论，抓住时机，在干中前进。他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邓小平认为，在实践中，对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是官僚主义的方式；另一种是说了就干，在干中间虽然也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比前一种方式要好，犯了错误也容易改正。他指出，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邓小平关于“不搞争论”的发明，是对历史和现象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的改革开放，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的意见。如果搞争论，越争越热闹，而且由于没有实践，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争来争去，就把时间争过去了，也就错过了历史的机遇。若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经济特区和农村改革展开无益的辩论，我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兴旺面貌。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就是邓小平采取不搞争论在于中前进做法的一个积极成果。

1979年4月，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提出创办特区的设想。邓小平当即决定，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他指示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两省考察。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地方创办特区。这便是“杀出了一条血路”。然后，当特区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1984年初，邓小平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对经济特区建设成就予以充分肯定。他为这三个特区的题词分别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就是这样以实践来证明办经济特区政策的正确性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的一大发明，正是循着马克思开辟的实践道路，摆脱了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5. 走一步看一步

邓小平在谈到城市改革问题时说过，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了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不仅城市改革，其他实践活动也是可以采取走一步看一步方法的。邓小平把走一步看一步看作是根本的实践方法。他指出，我们现在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发现问题就赶快改。他又指出，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可见，走一步看一步，是指发现问题赶快改，这是实践的一大原则，一大方法。这一方法，具体分为三个环节。

“走一步”是第一个环节。所谓走一步，是指按一定的决策、措施来进行实施。走一步到底要多长时间，这要看具体情况而言。邓小平说，如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它的成败。可见，城市改革要比农村改革复杂，这一步要有三至五年时间，才能初步见分晓。邓小平所谓的走一步，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步，而是带有某种整体意义的一步，在走这一步时，必须十分慎重。比如搞改革，我们先要理一理头绪看应该从哪里着手进行改革。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看一步”是第二个环节。所谓看一步，也就是对已经实施的决策及时收集信息，看看进行得怎么样，效果如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看一步也就是让原有的实践活动充分展开，由实践来检验“走一步”到底效果怎样。也就是让实践本身来作判断。

“及时总结”是第三个环节。无论是走一步，还是看一步，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因此，在走一步、看一步的基础上要及时总结，发扬好的，纠正错的。邓小平指出，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会犯大错误。

走一步看一步的实践方法，本质上是从实际出发的方法。只有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在走一步看一步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发展我们自己。

6. 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曾经讲过一句有名的话：“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更多地从实际中寻找答案，获得新的认识，确定工作方针和政策、策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种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的方法。这种方法，较之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风险性要更大一些。走一步看一步是对走一步决策已明的情况下如何走好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试验和摸索，完全可能产生摸不着石头的情况，从而也过不了河。如果摸不着石头，当然可以换个地方再摸。总的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法有如下突出特点：

一是探索性。凡采用摸索着前进方法的事情，都属于创造性事业，无先例，缺经验。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要摸索前进。这种摸索当然不是不费气力的，而是要花费精力的，它要解决如何摸索，从

哪个地方、哪些方面开始摸索，如果摸索不成又应怎么办等等问题。总之，摸着石头过河，是有强烈的探索性，它是人们面对新事物所应有的一种创造精神和创造方法。

二是反复性。摸着石头过河，正因为是摸索，完全可能失败。摸索前进的事情，一次性成功的并不多见。邓小平指出，我们所做的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有些事情不可能一次完成，甚至有时还可能出些差错。

三是风险性。由于摸索着前进，对于实践中会产生什么问题并不是很明确，因而免不了要冒点风险。因此，邓小平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还要多。在运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时，要充分估计到它的风险性。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指出，实践的过程没有完结，认识的过程也就没有完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邓小平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从本质上说，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这里，再一次体现出邓小平尊重实践的精神。

7. 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是邓小平一贯重视并反复强调的思想，也是他尊重实践的又一重要表现。

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到抓好教育工作问题时指出，各级领导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他强调，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又一次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在国贸中心大厦旋转餐厅，他从“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问题一直谈到要干实事的问题上。他一再强调说，“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邓小平认为，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必须克服形式主义。他认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它同扎扎实实地工作，注重实践、讲求实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是根本对立的。邓小平对形式主义是深恶痛绝、一直反对的。早在80年代初，他就提出，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很管用。毛泽东指定邓小平负责起草周总理的四届人大报告，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他办到了，而且很管用。他认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报道。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对这种形式主义，他建议抓一下。

在邓小平看来，破除形式主义，必须从领导机关做起。在多数情况下，形式主义是上头搞起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机关，要下决心精简文件、

会议、报表。一定要破除那种认为文件、文章一定要长、一定要面面俱到、洋洋万言，才能管用，才显得重要的观念，努力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章、短文件，只求说明问题、讲清道理。同时也要求我们的领导同志，力戒形式主义，避免不知不觉地当上搞形式主义或助长形式主义的角色，要把自己的精力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去。

邓小平关于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以及反对形式的思想，对于我们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8.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任何实践，都是人的实践。实践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精神。在邓小平看来，要使我们的各项实践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小平非常看重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并用它激励人们成功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艰苦奋斗问题时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这里，毛泽东所说的“精神”，主要指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思想。1980年，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这里，邓小平总结革命实践的成功经验，说明了人的精神，特别是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精神，是实践得以成功的保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根据历史的经验，反复强调了艰苦奋斗在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把艰苦奋斗作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他说，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奋斗。在即将进入90年代时，他再一次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抓60至70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越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邓小平关于当代实践仍要发扬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精神的思想，反映了客观的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不遇到风险。这不仅因为它是一场前人没有从事过的伟大的事业，而且因为伴随这场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的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人们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的深刻的变革，是一场革命。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在深化，开放在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建立和发展，我们的任务更加艰苦，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更加复杂，我们在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也将会更多。在这里，

机遇与挑战共存，困难与发展共生，没有奋斗不息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是绝然不行的。相反地，我们遵循邓小平的思想，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必将越来越红火，我们的道路就必将越走越宽广。

四、照辩证法办事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其中，谈了许多哲学问题。讲话的最后，毛泽东特别地指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1页）

是的，“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的一句名言，并一直成为他从事各项实践活动的座右铭。尽管他没有像一般辩证法大师那样去专门论述辩证法问题，更没有去构建一个庞大的辩证法体系，但是，他在其自身复杂多样而又广阔深刻的实践活动中，时时处处按照辩证法办事，从而发展了辩证法，推进了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成功地运用辩证法的光辉典范。就此而言，邓小平是实践辩证法的大师。

1.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事物普遍联系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纵向联系，也就是事物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不能不注意事物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联系。毛泽东十分注意这一点。他在抗日战争后的时局的分析中，曾经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3—1124页）这里，毛泽东由过去到现在，由过去和现在到未来，揭示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联系。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也十分注意事物的普遍联系，尤其重视事物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内在联系。他反复强调，要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首先，他十分重视历史，经常号召要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用历史上的成功和失败来说明现在。比如，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回顾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历史时，邓小平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中，可促使人们更正确、更全面地选择现在和未来的行为。另一方面，历史又是理解现实的钥匙。要理解现实，必须回顾历史。

当然，历史毕竟是历史，它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对历史本身也要分析，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而且，现实总是有新问题、新事物产生，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在，为了未来，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

其次，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立足现在，面向未来。想问题、办事情，既要看到现在，更要看到未来，要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他在1979年就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20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99页〕邓小平就是这样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繁荣

和发展，描绘出一幅幅辉煌蓝图的。

2. 发展才是硬道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不仅是普遍联系着的，而且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邓小平把这个一般的道理具体地运用到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科学说明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首先，他认为，在发展稳定的关系上，“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说，发展是主要的。只有发展，才有真稳定。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贯彻了发展的方针，自1984年至1988年经济有了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发展，“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可见，没有发展便没有真正的稳定可言。

其次，他认为，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在南巡谈话中，他曾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所谓稳定是相对的，是指其暂时性和有条件性。一定的稳定总是一定时期中的稳定，它是由各种条件所协调地形成的状态。所谓发展是绝对的，是指其贯彻始终性和无条件性。发展不仅是一种方向、趋势，而且贯穿于稳定之中，换句话说，稳定也是一种发展，只不过是较平缓的发展，发展又是无条件性的。发展的无条件性并不是说它不要条件，而是说它要打破而且一定会打破原有条件的束缚，创造出新的适宜发展自己的条件，尔后，它又要打破这些条件，永远奔腾不息地向前运动。

最后，他认为，发展和稳定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方面，没有发展便没有稳定。稳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有发展。邓小平以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说明了这个道理。他指出，1984—1988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可见，事物的发展总是发展一段巩固一段的，总是不断由“发展阶段”向“稳定阶段”转化的。另一方面，没有稳定，也就没有发展。稳定使发展的关系进一步理顺，理顺了关系也就巩固了发展。不仅如此，稳定又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使发展能够突破原先的稳定状态，进入到新的发展台阶。这一过程也就是“稳定状态”不断向“发展状态”转化的过程。若没有发展与稳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也就既没有发展，也没有稳定。

邓小平关于发展与稳定辩证关系的精辟说明，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3. 中国既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

事物本身就是矛盾，用矛盾的观点来把握事物，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毛泽东就善于从矛盾角度来分析事物。他认为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因此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曾以矛盾观点来分析中国和日本。他指出：日本是个小国，地小、人少、物少、兵少，日本又是个强国，军力、经济力、政治力在世界上是强大的；

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中国又是个弱国，军力、经济力、政治力在世界上是软弱的。这一日本是小国、强国而中国是大国、弱国的特点，决定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辩证分析的正确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也以辩证矛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自身，得出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辩证结论。1984年10月26日，他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4页）

邓小平关于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思想，抓住了发展中的中国的根本特点。一方面，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即使到发展战略第三步实现时，也只是达到人均4000美元，它只相当于现在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1世纪中叶，在世界上仍然在几十名以下，若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只是才摆脱贫困，才发达起来，中国确实是一个小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尽管不高，但综合国力却居于世界前列。

邓小平关于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辩证观点，有利于我们全面评价并发展自己，它可以使我们摆脱自卑、丧失前进信心的精神状态，又可以使我们防止陷入盲目乐观、夜郎自大的境地。只有立足于这一观点，才能使我们真正走向富民和强国之路。

4. 变与不变

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坚持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变与不变是对立的统一。不变便是相对静止，相对定型。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从社会的发展来说，一方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不变的东西，一切都要转化为其它；另一方面，每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都有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和相对稳定性，因为就这一阶段而言，它是相对不变的，变了就成为它物而不是它自身了。

邓小平所说的不变，正是指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不是一个短时期，它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大的方向、大的格局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只有使这些方面不变，即把这些东西稳定起来、定型起来，才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巩固和发展。邓小平指出：“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1页）也就是说，基本国策、基本原则、基本路线、大的方针、大的方向、大的路子不变，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在邓小平看来，不变不仅是基本的东西不变，而且与这些相关的一些敏感问题也要不变。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不能变，一变人心就不安。邓小平举例子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引者注）。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

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1 页）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变其它也跟着变，对于那些影响到全局的问题，便要更慎重、更注意。

邓小平所说的变，主要是指在不变的大格局下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具体运动。要改革、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当然要改变原有的体制、关系、程序，但这种变是不变指导下的变，是改革、发展总方针不变的大局下的变。如同静止不是不动，它是一种特殊的运动一样，不变也包含着变，这就与那种形而上学的僵死的不变性从质上区别开来了。邓小平认为，变一定不能否定不变的基本国策，他指出：“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1 页）

从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不变只是相对的。基本路线要管 100 年，就不是管永远；香港回归祖国后 50 年不变，但不是永远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基本路线也是要变的。基本路线只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随着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解决，这一历史阶段也就过去了，新的格局在新的条件下又要开始产生和定型，原先的“不变”的东西也就变了，但这种变又要形成另一个大格局下的不变的因素，于是又一新的历史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又产生出来，又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与不变的矛盾。邓小平所揭示的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是他尊重生活和历史辩证法的具体体现。

5. 要坚持两手抓

在我国，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两手抓”，这是邓小平多年来反复阐述的一贯思想，其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总结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所必需的条件，多次指出：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1980 年 1 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1986 年 1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

第二，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1982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1989 年 6 月 9 日，他还说，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在 1992 年 1 月至 2 月的南巡谈话中，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号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

第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邓小平早在 1979 年就提出，我们要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精神文明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风尚，也就不可能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能始终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第四，两手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强调两手抓的同时，多次批评了实际上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1980年1月，他批评了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犯罪分子、犯罪集团手软，采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同年7月，他批评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涣散软弱状态。1989年6月，他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但坚持改革开放和打击犯罪活动，今天回过头来看，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1992年初，在南方视察时，他还继续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是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关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两点论，指矛盾有两个方面，它们又对立又统一，构成矛盾的运动，因而看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两手抓，之所以说是两点论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是因为，既然矛盾有两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两个方面就都要抓住，使其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中发展。

6. 大道理与小道理

邓小平在实践中十分注意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并把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巧妙地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他把事物的整体、全局看作大道理，把事物的部分、局部看作小道理，并且强调，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

那么，邓小平是怎样认识和处理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即大道理与小道理的关系的呢？

首先，他认为，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即大道理与小道理是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早在1954年，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的总结中便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反过来，局部又是全体的局部，如果只有局部，没有全体，则局部也就不成其为局部了。也就是说，大道理离不开小道理，小道理也离不开大道理。

其次，他认为，必须以整体、全局作为主导，从整体、全局即大局出发，使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比如：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们的大局，有了这个大局，就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9页）

第三，他认为，必须由整体、全局来透视部分，即用大道理来审视小道理。因为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局部是全局中的局部，即小道理是大道理中的小道理。部分、局部即小道理，总是要受整体、全局即大道理的规范和制约的。只有通过整体、全局或大道理才能认识部分、局部或小道理的本来面目，从而才能准确地把握它们。比如，对于“三资”企业的看法就是这样。

“三资”企业是我国整体中多种部分之一种。若就其本身来看，它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就怕“三资”企业，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但是，若把“三资”企业放到与国家整体的关系中看，便可发现，它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成了社会主义整体的有益补充。也就是说，整体透视了部分，改善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三资”企业本身的特点和比例，它受到了社会主义灿烂之光的普照。

第四，他认为，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即大道理与小道理的关系上，必须兼顾两者，使它们在相互依存、相互协调中共同发展。整体高于部分，全局重于局部，决不能由此出发而去侵占、甚至剥夺部分，即不能忽略小道理的作用和意义。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并存的，只有相互协调、相互发展，才能开拓出更新更高的境界。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搞单打一，而要搞综合平衡；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而要两手都要硬。总而言之，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即大道理与小道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使之协调起来，才能既使整体又使部分、既使全局又使局部，即既使大道理又使小道理都得到发展。

7. “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是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其具体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是具体运用主要矛盾理论和方法的产物。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理论和方法。主要矛盾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事物复杂矛盾体系中的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与此相反，非主要矛盾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人们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邓小平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理论和方法用于解决中国新时期的社会问题。1977年复出后，他着力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失误，把我国主要矛盾由“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沿着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要矛盾进一步思考，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要矛盾群，即我国目前主要矛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所构成的统一整体。

邓小平在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理论和方法运用中，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和方法。其主要表现在于：

一是指出主要矛盾便是中心任务。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同年10月，他又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80年，他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

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他还提出，解决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人民生活改善，就要抓住主要矛盾，把它作为我们一切工作中的中心任务，要对此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只有扭住不放，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面貌。

二是把主要矛盾本身看作一个整体。他认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而中心与基本点互相联系，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主要矛盾本身的破坏。

三是要求紧紧抓住主要矛盾不放。邓小平以历史的观点看主要矛盾，认为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要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至少要管到下个世纪中叶，即中国成为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在这比较长的时期内，主要矛盾不变，但工作重心要变，比如1983年前重心是农村发展，1984年后转向城市；有时候发展是重点，有时候整顿是重点，等等。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主要矛盾所要求的，因而变中有不变，主要矛盾是其中不变的因素，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也要注意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相互依存性，依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努力解决好它们之间的矛盾，保证主要矛盾的正常发展。这也是邓小平所反复告诫人们的。

8. 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事物的运动总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谓平衡，指矛盾诸方面相对的统一和相对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有序的合理的比例和关系。所谓不平衡，指打破了原有的统一和稳定，超出了原有的比例和关系。事物总是在平衡与不平衡的相互交替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

邓小平把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运用到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

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好起来后再去帮助落后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平均发展不可能。先有一部分地区好起来，再去帮助差的地区，那就比较容易了。他还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这里，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然后波浪式地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是针对平均主义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的。“先富”是为了“共同富裕”。这样“先富”便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一是先富本身是勤劳致富。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是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富”。二是“先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共同致富，就是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裕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而不是贫富两极分化。“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2页〕三是先富和致富必须是以机会均等、平等竞争为原

则，防止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只有符合了这些条件，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并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9. 发展战略的“三步曲”

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向人们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无限交替的过程，而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着部分质变。它主要表现为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两种情形。所谓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就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次要的性质有所变化，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例如，人从生到死，经历了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些阶段，生理上出现的变化，就是部分质变的表现。

邓小平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特别是其中总的量变过程中阶段性部分质变的道理来指导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三步曲”。

1979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大平正方访问中国，向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搞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围绕这个目标，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他的中国社会发展战略蓝图“三步曲”。这就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算，“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6页）也就是我们发展战略的“三步曲”。

邓小平还对实现每一步的意义都分别作了说明。第一步——解决温饱的意义是：使人民群众能够得到实惠，社会得到安定，现代化建设将得以顺利起步；第二步——实现小康水平的意义是：到2000年，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就摆脱了贫困，物质生活就会更加好起来，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文化水平也就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意义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富强起来，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三步曲”的构想，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是切实可行的现实目标，具有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它一直在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宏伟目标而脚踏实地、奋发图强、艰苦创业。

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人类社会比做一座宏伟的大厦，那么，生产力就是大厦的根基，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是大厦的中间部分，上层建筑则是大厦的顶层。

众所周知，根基不稳，大厦就要动摇甚至坍塌。这个比喻，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生产力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是的，生产力既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首要前提，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要推动社会发展，不能不重视生产力。这一点，对于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来说，将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深谙这个道理。正因为如此，他不仅结合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精辟地说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深刻揭示了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并指明其不同构成要素的特殊地位，全面说明了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种种外部条件，为人们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1.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不仅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决定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调整与变革。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邓小平一再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1983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84年6月，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他又谈道：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1985年4月，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时，他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是一个什么社会？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才有可能实现按需分配。总之，无产阶级要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坚持不懈地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思想，为我们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它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真正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竭尽全力。

2.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存在许多模糊的认识。往往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问题，把发展生产力排除在社会主义本质之外。结果呢，把本来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把明明是束缚生产力发展、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附加在社会主义身上，结果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应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这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针对人们的糊涂认识加以反复强调。

早在 1978 年 9 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地得到满足。1984 年 6 月，在与外国朋友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对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到 1987 年 4 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建设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要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进而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始终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特别是在 1992 年春天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在总结以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的基础上，更加明晰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这一精辟的论述，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向新的境界，实现了新飞跃。

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进一步阐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

3.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善于让事实说话的邓小平，还以我们党和国家走过弯路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尽快发展生产力上，尤其是对我们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更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放在首要位置上。对此，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是有清醒认识的。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及时地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56 年底至 1957 年初，即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还强调，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自然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党包括毛泽东，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些思想，而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搞政治运动，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盲目地变革生产关系。这样，经常性的中心任务就只能是政治斗争，从而把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扔到一边去了。另一方面，又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又当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荒谬地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谁提发展生产力，就成了弥天大罪。然而，此时正当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许多国家的经济正在腾飞，我国却在狂热鼓吹贫穷，结果使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经济上本来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邓小平曾沉痛地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他还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基于这种沉痛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深刻地总结道：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他从这种教训中得出一条真理，即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4. 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生产关系的新形式，如“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他的“猫论”。邓小平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

邓小平的“猫论”，实际上是生产力标准的形象说法。这个说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诬为实用主义。其实，它与实用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它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好坏，最终是由生产力来检验的。所以，对于这种说法，邓小平并不因为受到责难、诬陷而放弃，而是以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巨大的勇气，始终不渝地肯定它。前几年，薄一波曾专就这一问题求教于邓小平，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说：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情况说的。我们应当学习邓小平的理论勇气，更应当坚持他阐述的生产力标准。

5. 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如果说，“猫论”是邓小平对于生产力标准形象说法，那么，“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是邓小平对生产力标准的更具体、更深刻、更准确的表述。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在南巡谈话讲到改革开放时提出来的。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首先，这个标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实践是认识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尺度。实践具有多种形式，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承认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实践标准，必然要承认和坚持生产力标准，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是非的根本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是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如何，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要求，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最后，“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和实质，就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国力得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前提，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至高无上的根本任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检验一切工作是与非、得与失、成与败的最高标准。可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把尚方宝剑，是裁决一切经济政治生活的最根本的原则。

邓小平确立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这个标准的确立，有利于牢牢把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会使我们牢固地站在生产力的大地上，抓住中心任务不放，卓有成效地从事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这个标准的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了根本的价值标准，提供了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准绳，不仅使人们从过去那种单纯用抽象的原则、概念剪裁和判断生活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而且也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了统一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这样，就会避免无为的争论，排除各种干扰，使我们的建设和改革事业沿着正确方向

发展。

6.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唯物史观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且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他还生动精彩地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和最强大的杠杆。”（同上，第47卷，第427页）恩格斯也高度评价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深深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重要意义。他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4页〕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现存观点上，而是追踪现代科技革命，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1988年9月，他在接见外宾时明确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到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又以非常肯定的语气重申了这一思想。他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378页〕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就其基本点而言，主要包括：

第一，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注重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

第二，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入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第三，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高科技产业化。通过高科技的发展，带动科技的提高和普及，推动整个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证科技人员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技工作上去。

第五，必须进行科技体制的改革，最大限度地解放科技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7. 劳动者是最活跃的因素

什么是劳动者？邓小平认为，劳动者就是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

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一是从生产力自身构成要素看。生产力构成要素尽管复杂，但从根本上说，不外乎人和物两大基本因素。物的因素当然是重要的，没有它，人的能动性再大，也不能形成任何生产力。但是，物的因素是死的，如果没有活生生的人，没有人的能动性，它只能是一堆死物，也不能形成任何的生产力。从死的生产力向活的生产力转化，必须经过人的活动。因此，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二是从劳动者对生产力的驱动作用上看。人的需要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发端，因而也是生产力的原动力。原需要的满足，新需要的不断产生，推动了生产力不断地发展。没有劳动者的“最活跃”的需要，也就不会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正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生产力中占有首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邓小平在阐述发展生产力时，一再强调发挥劳动者的作用。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呢？邓小平强调了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两点：

一是要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5页〕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全国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此后，邓小平还多次提过提高劳动者“管理、技术、文化水平”，“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能力”以及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问题。

二是要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政治素质，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邓小平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多次引述毛泽东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在新时期，他自己也一再强调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里的“德育”、“社会主义觉悟”、“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说的都是劳动者的政治素质，即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政治思想品德问题。邓小平极为重视政治素质的培养。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5页〕这里，邓小平既指出了劳动者的政治素质对科学文化素质的促进作用，也指出了劳动者的政治素质对发展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8. “老九”不能走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靠科技和教育，而知识分子是科技与教育的主力军。因此，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一直是邓小平关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为知识分子正名，为知识分子呐喊，为知识分子恢复、确立本来应有的社会位置，为知识分子创造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综合考察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对知识分子问题，他做出了如下两方面突出的贡献。

第一，反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极力改变知识分子所不应该处的“老九”地位。远在汉代，知识分子就被贬为“老九”，即所谓“九儒十丐”。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被冷落，恐怕还是本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迫害，被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邓小平复出工作后，首先主动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他引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说，“老九”不能走。他还郑重地宣布，“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无论是文教还是科技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应该肯定。不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针对“四人帮”的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8页〕后来，在全国工作会议上，他还特别地强调，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可以说，作为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尊重知识分子最多的人。

第二，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想方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针对长期以来造成的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情况，邓小平多次重申，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他强调，用非所学是浪费人才。解决用非所学，是当务之急，要抓紧解决，尽快解决。邓小平根据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强调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一周至少用六分之五的时间专门搞科学研究。不能要求科技工作者参加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他还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知识分子放开手脚，大胆地去探索真理，去攀登科学的高峰创造了争鸣气氛。他要求做好后勤工作。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他主动提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做好后勤工作。在生活方面，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爱心，他和全党同志一起，10多年来，制定并实施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职称评定、工资、医疗、住房、奖励、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离退休、兼职、配助手、人才流动、出国留学等等数百个政策规定，使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他们的劳动成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他们的人格受到了社会的尊重，他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同时，他们的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9.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明确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指导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理论纲领。

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则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把被束缚的生产力从中解放出来，通过革命来解决问题。革命的任务，就是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还有一个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个问题，许多人认识不清楚。阐明了这个问题，正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卓越贡献。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仍然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运动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不完全适应的矛盾问题。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常把这种矛盾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试图用政治运动甚至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来解决，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正确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并在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在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解放了原有的生产力，而且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发展了新的生产力。邓小平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在总结我国 1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改革之所以能够解放生产力，是因为改革的锋芒所向是旧体制，是要改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在生产关系大系统中，经济体制作为生产关系各个环节的具体形式及结构，同生产力有着直接的联系。生产关系促进或束缚生产力，总是通过经济体制来实现。邓小平早就指出，对体制的革命要比对人的革命更为深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能够解放被旧体制束缚了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而且能够解放被束缚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进行技术更新的能力，使得科学技术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还能够解放未被充分开发与利用的劳动对象。因此，邓小平深刻地总结道：“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8 页）

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不仅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十几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的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对改革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最生动的说明。

10.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时说：“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这里，邓小平告诉人们，在中国，要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必须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呢？在邓小平看来，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历史经验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中国之所以落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闭关自守。他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敌视和封锁政策，大大限制了我国与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50年代，我们曾一度对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也中断了。所以，我们是在一种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从事建设的。当然，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肆意歪曲自力更生方针，对外经济工作被戴上了“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的大帽子。致使把我国的经济建设同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隔绝开来。面对沉痛的历史教训，邓小平作了认真的总结，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他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历史性的告诫：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必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第二，对外开放是我国国情的客观要求。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迫切需要敞开国门，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及设备，利用外力来武装自己，发展自己。

第三，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首先，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的科学技术基础多么雄厚，都存在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切科学技术问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不可能拥有全部新技术，更不可能在一切科学技术领域里都居领先地位。其次，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具备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所有资源，需要或多或少地从他国取得这样或那样的原料补充本国资源的不足。再次，任何一国的发展，都需要他国的市场，尤其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关系愈来愈密切，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和依赖程度更加紧密。

邓小平不仅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对如何实行对外

开放，也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最少 50 年到 70 年不变，不但本世纪内不能变，而且，下个世纪的前 50 年也不能变。

对外开放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实行对外开放，完全依靠外国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原则。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对外开放要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既要对外开放，也要对东欧国家开放，还要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

对外开放是多种形式的开放，既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又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既要合理利用外资，又要积极发展对外文化交流。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在实践上为中国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必将使社会主义的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六、走群众路线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邓小平认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一样特别重要，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出色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他不仅精辟地说明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而且为人们在实践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树立了表率。他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反对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等一切否认群众历史作用、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可以说，走群众路线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鲜明的人民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突出特点。

1. 群众路线特别重要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邓小平非常重视这条路线，并把它作为一条根本的工作路线予以弘扬。他不仅进一步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容，而且反复强调了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

什么是群众路线？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作过很好的说明。根据他们的思想，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一方面，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简而言之，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群众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党的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决策，为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终于战胜了国内外强大

的敌人，建立了新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么，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09页〕

在社会主义时期还要不要坚持群众路线？邓小平一再指出，群众路线不但不能丢，而且要经常地、反复地加以强调，并结合新的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艰巨复杂的、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没有人民群众的参加并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不能成功的。“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2—143页〕另一方面，我们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果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也会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更要特别强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总之，群众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还是我们获得成功、走向胜利的路线。

2. 得人心者得天下

1931年9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县苏维埃主席黄正就利用职权非法向工人摊派生活津贴费，搜刮工人血汗，工人群众反映到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即组织人调查核实，召集会议决定严肃处理。有的同志说黄正以前做过不少革命工作，请求从宽处理。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原则问题，来不得感情用事，如让这种人继续呆在苏维埃政府里，只能败坏党和政府的名声。会议决定撤销黄正县苏维埃主席职务，向全体工人作检查，退赔全部款项。

黄正问题的出现，在邓小平思想上引起强烈震动，他召集干部们推心置腹地讲，要让群众信赖苏维埃政权，就要真正代表人民，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苏维埃政权虽小，可她是第一次与群众见面，她在群众中的声誉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为了堵住漏洞，邓小平挑选了几个得力的干部充实到县委监察机构，在县、区、乡、学校、厂矿设立了举报箱，在集市圩场开辟了黑板报专栏，发动群众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进行检举揭发；一旦发现问题，经查实后就立即处理。这样，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密切了党群关系。

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思想。通过以上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邓小平坚持了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他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因而高度重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意义。

3.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实践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在他全力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例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就曾明确地表态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的“群众要求”、“群众创造”。我国农村自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的群众要求屡次兴起屡次被压了下去。到了80年代，当我国农村在改革大潮中再度出现包产到户又再度遇到重重阻力时，邓小平又及时站出来，给予农民群众以巨大的支持。1980年5月，他在同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时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5页〕正是在邓小平的有力支持下，我国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如燎原烈火，在很短时间内席卷全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1992年春天，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回顾了这一过程，深有感触地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后来，他还说过，联产承包是农民提出来的，乡镇企业也是群众创造的，我的功劳是把群众的创造加以理论的概括。这些话，既是邓小平谦虚精神的表露，也是他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具体体现。

4. 倾听群众的呼声

邓小平总是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以及人民群众拥护与否，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政策得失成败和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经就这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作过多次重要讲话，其中主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79年，邓小平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第二次是在1983年，邓小平强调，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第三次是在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本人就是坚持用这一标准来检验一切工作，特别是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典范。在十几年改革开放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当出现对改革开放的种种非议和责难时，他总是以这个标准来说服那些怀疑改革开放政策正确性的人们。

正是由于邓小平坚持了判断标准的人民性，所以，他在回答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问题时，总是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现在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

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水平就要下降，我们会丧失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他还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改变了，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所以人民不会赞成。不但我们这一代不会变，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第五梯队都不可能变，变不了。在 1992 年春天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读着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判断改革得失成败，考虑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总是着眼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种处处以人民之忧而忧、以人民之乐而乐的思想感情，充分反映了邓小平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做人民的儿子

1981 年，邓小平在给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写的序言中这样说过：“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人民的儿子”这一形象的说法，真实地反映出邓小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思想。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956 年，邓小平在回答国际青年代表团向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是什么”问题时，他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邓小平文选》（1938—1965 年）第 245 页〕那么，怎样坚持这个准绳呢？在邓小平看来，应当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是领导与服务的关系，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二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树立当好人民“公仆”的观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三是权力和义务的关系，树立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其核心是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权力的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它没有任何超出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四是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树立无私奉献的观念。共产党员当然应当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领取应得的报酬。但是，共产党员同非党员相比，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更多地牺牲个人的利益。

此外，邓小平认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还要切实关心群众生活。他指出，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生活。他要求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只要我们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6. 不要侵犯群众利益

在群众路线的丰富内容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一条。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一条。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把维护群众利益视为事业的生命，反对一切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这一点，从如下两个故事中略见一斑。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春，邓小平率领部队插入敌后。当队伍行至山西阳城，经过东西洪村时，遇上日伪军“扫荡”。部队受阻，不能按原计划继续前进。当时正值青黄不接，老百姓生活很困难。邓小平就和大家一块挖野菜充饥，渡过了七个日日夜夜。一次，一名新战士不忍心看着邓政委和大家一起挨饿，就设法搞了一个玉米棒子，高高兴兴地送给邓小平。

“为了它，你费了不少劲吧？”邓小平问。

“那当然，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粮食的树洞才搞到的。”新战士擦着头上的汗水回答。

“拿群众的东西，给群众留钱了吗？”邓小平问。

“当然留了，还写了一张条子呢！”

“好！”邓小平先是表扬了这个战士，接着又严肃地对他讲，“这玉米是老百姓留的种子，你立即把它送回去。”新战士知道自己错了，红着脸答应一声“是”，就走了。

事后，邓小平把全体战士集合起来，问大家：“毛主席讲，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

“是鱼和水的关系。”

“那么，鱼离开水会怎么样呢？”

“只有死路一条。”

“对。”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亲自为我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决不能因为自己遇到一点困难，就违反纪律，侵犯群众利益。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半年

了，正赶上 1948 年春节，又逢休整。大家自然就想改善生活了。有的人到池塘去抓鱼，有的到河里去摸虾，有的上山去打柴，有的去寻找黑木耳。

到池塘抓鱼的同志，手里没鱼具。他们围着池塘干着急。这时，有人想出个点子：把池塘水放掉。

很快，池塘被挖开了口子，用简单的工具在流水口截鱼。水流干了，得到了几百斤鱼。同志们自然兴高采烈地欢呼这个“胜利”。这对当时处于极艰苦的环境中的部队来说，也确实是个不小的收获。

正在这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上过来了。他严肃地指出，池塘的水是群众备旱用的，竭泽而渔，贪图了眼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大家后悔莫及，可覆水难收啊。这些同志只好向群众道歉并赔偿损失。

接着，邓小平亲自起草了通知，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群众利益，维护好军民关系。

以上两个故事，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邓小平时时处处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崇高品质。他为人们走群众路线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7. 把官僚主义抛到粪缸里去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动员群众的方式时曾经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同官僚主义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邓小平也一贯反对官僚主义。1956 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指出，现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它妨碍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必须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1980 年，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他又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循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87 页〕

邓小平并没有停留在对官僚主义现象的表现和危害性的这样一般性问题的认识上，而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官僚主义归咎于旧社会的遗留，而应从我们的制度中找病根。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总病根是权力过于集中，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

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正是基于对官僚主义根源的分析，邓小平提出，克服官僚主义，不能靠政治运动，而是一靠思想教育，二靠体制改革，根本的靠体制改革。过去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之所以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从体制上找病根，没有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同群众的联系，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8. 领袖是人不是神

如何看待个人和群众特别是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历史观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坚持群众史观，反对个人崇拜，他明确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

1956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专门谈了领袖的作用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党中央历来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23页〕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科学态度。

在实践上，邓小平正确处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出色地表现在对中国人民的伟人领袖——毛泽东的正确评价上。

毛泽东逝世后，对于这位历史伟人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曾产生过两种倾向：一种是任意贬低甚至全盘否定的倾向；另一种是全盘肯定、任意拔高的倾向。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同这两种倾向进行了毫

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应当是这样。根据这种认识，一方面他指出，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感情用事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的最大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贬低毛泽东、否认他的历史功绩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得人心。因此，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对毛泽东的错误不应隐讳，而应给予恰当的客观的评价。他说，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否认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晚年错误，把他神化，既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因此，邓小平不仅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的错误，而且公正地分析了毛泽东错误的性质、责任和历史根源。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既纠正了各种错误倾向，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正确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为人们正确对待领袖人物树立了榜样。

七、立足于独立自主

1956年春天，毛泽东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写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论十大关系》。其中，在论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针对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和崇洋媚外思想，他曾经批评道：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毛泽东要求人们鼓点劲，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这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是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是的，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巧妙地运用和深入拓展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他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反复强调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我们事业的立足点。由此出发，在建设道路上，他主张走自己的路，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在依靠力量上，他提出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在民族精神上，他维护我们国家的国格和主权，要求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对丧权辱国、民族自卑；在对外关系上，他反对超级大国和世界霸权主义，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辩证地解决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克服了闭关自守和崇洋媚外两种错误倾向。总而言之，立足于独立自主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1. 走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打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便可发现，“走自己的路”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原则。

所谓走自己的路，在邓小平看来，主要是指：立足于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因地制宜地寻找和选择自己的道路；不照抄、照搬别国、别地区或别人的经验或模式；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呢？

一是从历史上的经验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道路，从而保证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确定的中国革命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也曾多次强调不要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应当走的建设道路。当然，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认识，我们也做了许多违反中国特点的事情，因而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过挫折。正反两方面经验说明：能否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坚持走自己的路，是一条关系革命和建设成败的根本原则。

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伟大成功，是坚持走

自己的路的结果；城市改革取得一系列进展，也与坚持走自己的路分不开。

总而言之，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坚持走自己的路，是邓小平独立自主思想的首要表现。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像当年毛泽东开创中国革命道路一样，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2. 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向大会致开幕词，赢得了代表们的阵阵掌声。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庄严地向世人表明：“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为什么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自力更生为主呢？

邓小平曾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中国；60年代，原苏联敌视、威胁中国。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国基本上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被迫处在世界之外，当然影响中国的发展，但同时又迫使我们奋发努力，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搞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等。自力更生使我们没有成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附属国。所以，1982年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邓小平把自力更生为主作为中国的“首要经验”介绍给第三世界朋友，并强调指出，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借此加速发展。

其次，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企图完全依赖外援使国家强盛起来，是不现实的。一切依赖外国的思想，都只能是幻想。

最后，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承受能力比较大，不管引进多少外资，它所占的份额还是小的。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补充总是有限的。而且对外来的技术等，还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

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来办，自力更生为主，集中反映了他独立自主的思想。

3. 维护独立自主的形象

人都有自己的形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的形象。问题是：应当具有怎样的形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重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并作了精心的设计。

他认为，中国的形象在近现代、当代和下世纪50年代，已经和将要依次

经历三次带革命意义的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它集中地表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第二次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它集中表现为中国活跃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坚如磐石地“站住了”。

到下世纪中叶，当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候，中国的形象还要发生第三次变化，这次变化将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以富强、民主、文明的崭新形象，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中国的形象在近现代、当代和下世纪50年代已经和将要经历的三次意义重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从“站起来”到“站住了”一直到“岿然屹立”。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设计的总体形象。

邓小平不仅高瞻远瞩地设计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总体形象，而且还精心设计了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具体形象。在邓小平的具体设计中，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应当向世界展示的主要有五种形象：

- 一是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
- 二是要努力造就“经济大国”的形象；
- 三是要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
- 四是要保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形象；
- 五是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不难看出，邓小平关于我们国家、民族形象的设计，无论是总体上的还是具体上的，都立足于独立自主。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为世界东方的巨人，那么独立自主就是他基本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邓小平把独立自主设计为我们国家、民族形象的重要方面，是他立足于独立自主思想的具体体现。

4. 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什么是国格呢？它是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品质、价值的总和，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形象的统一。如同人要珍惜人格一样，国家要十分珍惜国格。人失人格，人将不人；国失国格，国将不国。

邓小平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始终坚定地捍卫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格。他一贯强调国格的极端重要性。

国格之所以重要，因为国格是立国之本。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邓小平认为，懂得中国历史，是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翻一翻世界历史，便会发现，没有一个不珍惜国格的国家能坚强地矗立于世界之林。

丧失国格，中国人民不会原谅。邓小平曾作出这样的论断：“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这个论断可以说一针见血。因为中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遭受了无法忍受的外敌侵略和压迫，国家曾经被帝国主义列强

任意瓜分，人民曾经被他们任意残杀，财富曾经被他们任意掠夺。中国各族人民吃尽了丧权辱国的苦头。所以，中国人民倍加珍惜自己国家的国格。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假如中国的什么人轻视国格问题，中国丧失了国格，中国人民是决不会原谅、决不会允许的。

国格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国格国权与人格人权相比，国格国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需要。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企图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坚决维护自己的国格和国权，国家就势必发生动乱，不仅根本谈不上自己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所以，国格国权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对国格的尊重和维护，是他立足于独立自主的体现。

5.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香港问题成为 19 世纪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1840 年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于 1842 年签订了《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60 年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缔结《中英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 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的 200 多个岛屿，期限 99 年。对此，中国人民历来都未予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强调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条件成熟时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民致力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件大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2 年 9 月 22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就香港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坦率的会谈。会谈之前，中国领导人向上百名中外记者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将在 1997 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24 日，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举行会晤。撒切尔夫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对此，邓小平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 页）在这里，邓小平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香港问题可以谈判，而主权问题不容讨论。

后来，针对港英舆论及谈判时英方对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质疑，邓小平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中国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中国政府要在香港驻军。驻军象征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象征着中国的主权。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就有驻军的权利。

1984 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了重大的突破。9 月 26 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一项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其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决定于上述日期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标志着香港问题将得到合理解决。

邓小平在解决香港主权问题上坚持的原则立场，特别是他提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的原则，是他立足于独立自主的生动例证。

6. 我们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的独立自主思想在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

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联合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各国家的党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然而，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只强调联合，而忽视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只强调共同规律，而忽视各国党要结合各国自己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原苏联共产党利用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老子党”自居，大搞以我为中心，粗暴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随便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甚至随意解散别国的党。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严重的恶果。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抵制了前苏联共产党的许多错误做法。

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

邓小平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我们反对“老子党”，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

为什么不能对别国党发号施令，而要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 and 探索呢？这是因为，最了解自己国家和党的情况的，毕竟还是该国的人民和党员。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否正确，最有资格判断的是本国的人民和党员群众。事实证明：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只能依靠各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作出选择，进行探索，既不能照抄书本和外国的经验或模式，更不能由外国的党或力量加以强制或干涉。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目前我国已经同包括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友好政党的近 200 多个政党、组织有了不同形式的关系、交往和接触，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合作。

7. 我们不打“美苏牌”

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会见了巴西总统菲格雷多。在谈话中，他明确地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7 页）

邓小平提出这个不同任何大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战略原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鉴于结盟会或多或少地束缚我们的手脚，有碍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二是作为一个大国，如同苏、美任何一家结盟都不

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

在中苏关系方面，从 60 年代初两国两党关系冷却后，逐渐有所松动，有所缓和。但邓小平指出，要实现中苏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苏联必须清除它设置的三大障碍，即苏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军入侵阿富汗，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军。1986 年，年已 82 岁高龄的邓小平谈及中苏关系时说：我已经老了，出国访问的任务应该说已轮不上我了，但如果苏联主动消除三大障碍，那么我愿破例去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会谈，以改善中苏关系。

在对待中美关系上，邓小平在 1979 年曾以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后来几年，中美关系有了较大改善，双边贸易额显著增加，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也有所放宽，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也在 1985 年底生效。尽管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如在朝鲜、中东、南非洲和中美洲等问题上，邓小平则批评美国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台湾问题，邓小平在 1986 年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就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

邓小平关于既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的思想，是他独立自主观点的又一重要表现。遵循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国既不依据苏联的意图来考虑对美国的政策，也不依据美国的意图来考虑对苏联的政策，同时也不在苏美之间搞无原则的等距离，而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出发，按照每一国际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采取对策，从而在对外关系上和国际事务上处于游刃有余、自由自在的主动地位。

8.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

邓小平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我们的立足点，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学习外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反地，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他独立自主思想的重要特色。

为说明这一点，先让我们从 414 别墅对外开放的故事说起。

414 别墅指的是位于上海市西郊的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414 招待所。这里有山有水，有牡丹园、翠竹园、桂花园、腊梅园代表春夏秋冬四季。在浓密的树林中，掩映着三幢别墅楼，三楼连成一体，外墙一律涂为绿色，和周围的树林融为一体。

414 别墅不仅风景优美，别具一格，而且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为什么呢？一来是因为当年毛泽东来上海就住在这里；二来是因为它自毛泽东 1967 年最后一次住进后，被空关了整整 10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进了这个神秘的地方。“414”的开放也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这件事关系重大，市领导自然十分慎重。

1979 年 7 月 16 日至 25 日，邓小平来上海视察，住进了招待所的一号楼。几天下来，邓小平观赏了花园里的不少景观。有一天，他在散步时，把市委招待处处长叫到跟前，十分感慨地说：“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

邓小平望着远处的花草树木，又说：“这是一块黄金宝地啊，国外哪有这么大的房子和花园作别墅的嘛？我看平时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了外汇，支援四化建设嘛……”以后几天，邓小平早晨散步时就帮助陪同

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规划“414”的蓝图。前后近10天，邓小平跑遍了414的每个角落。

7月24日下午，邓小平召见了全体市委常委，提出给大家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

随后，市委作了专门研究，成立了修建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亲自挂帅。

邓小平打开“414”大门的讯息传到北京，传到了全国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全国各地类似的花园别墅也先后开放。

414别墅对外开放的故事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思想。

是的，邓小平明确地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8页〕他反对那种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争取外援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 and 做法。他在分析两者的关系时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邓小平关于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关系的辩证分析，既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明了方向，又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辟了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与这一思想的指导，是密切相关的。今后，继续坚持这一思想的指导，必将使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后记

本书是根据山东省出版总社和明天出版社领导的提议，特意为《少年哲学向导》丛书增加的一册。原计划由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李光耀教授负责编写，但因李教授公务繁忙，难以如期完成，便由笔者勉为其难。

在写作过程中，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李光耀教授和魏淑君女士曾给予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笔者的老师——山东大学毛泽东邓小平研究中心主任樊瑞平教授，在百忙中拨冗审读初稿，提出许多具体而中肯的改进意见；本丛书中由笔者编写的另两部书稿，也曾得到樊先生的指点。在此，特向樊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刚刚起步，加上笔者接受写作任务时间较晚，特别是由于本人常识浅薄、水平有限，研究不够，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周向军

1994年8月30日于山东大学

周向军，1952年生，山东栖霞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88年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系副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或参加编写《毛泽东哲学思想纲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当代哲学》、《建设与改革的哲学》、《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等著作多部。有数项成果获省级奖励。

